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校文革筹委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事記

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碍，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形势很好，但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十分激烈。

我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子很深很粗。它来自省委、机关党委、省文革小组和校党委。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前，它通过党委、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得到贯彻；文革筹委会成立后，党委靠边站了，筹委会掌握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大权，这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通过筹委会来贯彻。由于筹委会内以孙润芝同志为首的一些主要决策者，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校仍然存在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没有米赤的朱赤式校党委。实践证明，筹委会已成了我校当前运动的主要阻力。

《红旗》社论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既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坏就正确地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吴懿。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因此，对校党委领导小组、工作组和文革筹委会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必须彻底肃清。

当前，首先应该彻底肃清掌握实际大权、对运动影响最大的文革筹委会少校决策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这样，才能使六中筹委会真正成为“敢”字当头，依靠群众，站在群众前头的革命司令部，才能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暢行无阻，才能真正实现毛主席所讲的“大民主，才能彻底肃清孙、王文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朱赤、吴懿、孙润芝的阶级斗争分子揪出来，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筹委会少校决策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如《红旗》社论

指出，“一直围绕着对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筹委会内以孙润芝同志为首的一些主要决策者，在对待群众问题上，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以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甚至上报里材料、黑名单，要把革命闯将（二十五宁红卫兵中的十二宁同老）打成“反革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严重影响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露、批判、斗争，阻碍了运动的发展。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筹委会一些同志直到现在还不肯承认自己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肯按照中央提出的“五条”来做，来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是继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违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下面，我们根据初步材料，编写了自筹委会成立以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事记。供全体革命同志参考。这只是初稿，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待以后进一步补充、修改。虽然筹委会某些决策者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还没有全部揭开，我们搜集的材料很不完整，但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筹委会贯彻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性。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我们必须继续揭露批判筹委会内部的反动路线，把它揭露深透，肃清其影响，从而把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一大步。

(一) 八月十三日：工作组离校前，一办建立校“文革筹委会”。“文革筹委会”成立前，工作组一再讲：它是筹备选举文革的组织，几天之后就要正式选举文革。因此它的产生非常草率。没有按照“十六条”所指出的按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进行选举。它的候选人是由各学习小组推派，并要校党委也派一名代表参加（实际上是要校党委进行控制）。于是校党委就推派了省委委员、组织处长孙润芝参加。所有候选人均未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讨论。等全选举文革的组织成立以后，不久摇身一变，就成为我校文革的权力机构。它受省委、机关党委和前省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制，使我校仍存在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

(二) 八月十三日晚，筹委会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进行了分工。孙润芝提名保皇大将迟法吴担任筹委会付主任（未被通过），其他委员则把步连、王文彬、组织处长孙润芝推上主任的位置。于是孙润芝身兼两任。既是校党委的负责人，又是筹委会的主任。会后孙润芝把筹委会分工情况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朱赤禀报。筹委会实际上成了没有朱赤的“朱赤式校党委”。

(三) 八月十四日，筹委会动员群众挑选工作组。派出工作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体现。党中央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决定撤销工作组。而被工作组一手包办组织起来的筹委会，

一开始就暴露了他们不信任群众，不相仗群众的革命精神，提出要掩盖工作组，抵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 八月十七日下午，筹委会研究我校运动曲折时，机关党委派委员刘子正（省委委员、省人事局之长、省高级党校组织处长、杨献珍的得意门生）参加。刘在会上散布：“米赤的材料祇是孤立的几件事，看不出一个过程。”合着为米赤开脱罪责，又讲什么“毛主席说过要从最坏处着想。牛鬼蛇神（刘子正心目中的革命国际的别称——注）不要一露头就打。”说什么“运动后期还要反右派”，以威吓革命群众。刘所作的这些黑指示，筹委会都接受了，直到现在，筹委会对刘的黑指示，始终保密，不敢揭盖子。

(接下页)

四、八月下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皇派对筹备会负责人进行了串联活动。早在筹备会成立之前，孙润之一回到就和王一波到省委处长吴明文家中长谈，说：‘沐赤材料中诬蔑工农兵文章尾巴问题有出入；顶事问题只有一个人据，没有旁证等’。筹备会成立后，在第一次揭发批判朱赤前夕，朱赤也到孙润之家串门活动；一些保皇派也进出于孙的家门。

六、八月廿四日：斗争刚开头，“过火”枪就露头。在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下，第一次召开了初步揭发批判朱赤内容的“讲用会”。会上筹备会付主任刘良吉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流露了右倾情绪，说什么“修正主义的基础”，除已经臭名的以外，对我校运动持有异议，开始流露了他们同广大革命群众的分歧。

七、九月一日：在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下，召开了揭发批判保皇大将迟决美的大会。斗争很激烈，但打得不深不透，根子没有挖，后台老板都沒有揪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草草收兵。

八、同一时期：在几次全校范围内召开的揭发批判大会上（包括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皇派），筹备会少版决策人，不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而是依靠一些所谓知情人士揭发批判，结果造成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会上名为揭露者，实则标榜自己，或附和者，真色狼。

九、九月六日：为了适应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数的需要，把红卫兵组织匆匆忙忙建立起来。红卫兵的干部，全部由筹备会少版决策人指定，违反了“十六条”规定，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十、同日下午：孙润之以党委负责人的名义去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回来又以筹备会主任身份责问。在博爱省委会议精神中，散佈了一系列恐慌情绪，诬蔑革命师生，说什么“形势很紧张”，“赖可可六天六夜没有睡觉”，“陈沫在灌氧气”，“康健连心肺病发作，差一具翅膀子”，“上海有学生冲进市委大楼，学生把玻璃打碎，把自己手上的血往脸上一抹，大叫干部打死等”。並当场宣佈要红卫兵去“保亿大楼”，说什么“保亿大楼研究室”，对叛人都不能讲。於是晚饭后，由筹备会主任、付主任孙润之、刘良吉等把红卫兵

以后批判
还要再点名
了。”并扬言“我对
关东情况也有了解。”
“新”来的
联络员（除宁
波同志外）

从后门领进省府大楼。

十一、九月八日：孙润之以红卫兵大队长的身份，晚上在省府大楼传达省委沈策的意见。说什么“形势仍然紧张”，要红卫兵（保卫大楼的同志）提高警惕，继续制造“恐怖”气氛，诬蔑革命师生。

十二、九月九日：对待革命师生如临大敌。按红卫兵牛队领导，向大楼的红卫兵传达说：十日省委要召开欢迎首都和外地来杭的革命师生的大会，要红卫兵把大楼周围的石块、铁丝绳子等物全部收拾干净，怕革命学生将这些东西攻打大楼。

十三、九月十一日：筹备会付主任刘良吉得到主任孙润之的支持，写了一封致外地革命师生的公开信“对外地师生来杭进行革命大串连，进行恶毒污蔑，骂他们是‘周易里爬出来的’、是工狗壳子，农群众白养活你们的”。“该算不多”。

十四、九月十二日：二十五个红卫兵目睹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许多破坏行为，实在忍不住，写了一张“忠告司令部——造省级机关红卫兵总部的反”的革命的大字报，盖到筹备会主任孙润之、付主任刘良吉身上，说“孙润之皮裹的百般阻挠，不准25个红卫兵进去闹革命”，把大字报贴到大

移外面去。孙润芝让布置守卫南大门的红卫兵不要让红卫兵冲出去闹革命。刘良吉用组织纪律吓唬革命群众，说什么你们造反了红卫兵的誓言？下级要服从上级，少岐要服从多岐。最底层25个红卫兵冲破阻力，打响了揭开省委领导阶级反动路线的腥风血雨的第一炮。一声震耳，吓破了一小撮人的胆，鼓足了革命群众的斗志。

(十五)九月十三日——十五日：革命群众25个红卫兵冲出来后，要求扩大会议，筹委会少岐决策人始终不予支持。说什么：“召开这样的会，要造成左派分裂，红卫兵分裂，筹委会分裂。”筹委会主任孙润芝对刘良吉的压制红卫兵闹革命的反动行为，一直持腰，说什么：“你要经得起考验。”刘良吉散布“造反而理，要有前提，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也得到孙润芝的支持。筹委会主任两次要态度。扬言：“我不赞成开这样的会”并公然在大会上压制，三次退出会场。还声称：“不赞成开这样的会，公然破坏大会。”说什么：“如果你们要开这样的会议，我不主持会议。”说后屁股一拍就走，明目张胆地污蔑革命群众，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刘光业的极其错误的言行，居然得到筹委会某些人的支持，说什么：“要态度到也好，否则不得了。”筹委会主任孙润芝面对这种情况，一言不发，当大会无人

主持时，他也不愿主持，公然站到革命群众的对立面。

(十六)、九月十五日：革命群众写了一批揭露省委司令部的大字报，筹委会少岐决策人惊慌失措，怕得要死，筹委会五个正付主任中没有一个敢出来领导，而某多方阻挠。当革命群众把大字报写好，决定九月十五日送省委，派人去筹委会去请示，筹委会少岐决策人却说：“你们要送你们去送，我们不管。”这样就要犯错误。“派代表送去罢？以后又说：“你们要送把大字报集中起来再送。”并提出要召开组长会议，把骨干留下，以阻挠群众的革命行动。革命群众对此很不满，正在写批评筹委会的大字报，他们看到形势迫人，才由孙润芝出面讲，我们同你们一道去送大字报。正当革命群众敲锣打鼓立即行动时，他们又出了一个新主意，说：“到外面去要慎重些，不要被别人抓辫子。”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写好的大字报，在大会上一字一句研究删改，美其名曰群众审查通过”。就这样，把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删掉了，如揭省委怕字当头的大字报中，把省委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样重要的字句删掉；摸了“省委犯了严重错误”的字句。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还擅自扣压了两张革命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为江华同志的公开信。他们就是这样千方百计阻挠揭露者委羞于的。

〔十七〕同天下午：当大字报送省委三处，^{省委办公室}一些负责人躲在门后，不敢出来。革命群众对省委接待站的非礼刁难行为提出了抗议，筹委会不仅不予以支持，相反事议“提出非理，说什么‘滥用集体名义提抗议’，‘提抗议也不和筹委会商量一下’，这样就是‘无组织、无纪律，要犯错误’等文。以此来恐吓革命群众。

〔十八〕九月中旬：革命群众给省委送了第一批大字报之文，筹委会少部分决策人吓坏了，怕得罪“上司”，丢掉乌纱帽，由筹委会主任刘良吉出面，给沈秉衡写信，告革命群众的状，他们急急忙忙向机关党委报黑名单，黑材料，把二十五个红卫兵中的十二个人分成三类，企图把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

〔十九〕九月中旬：筹委会主任刘良吉在革命闯将造反而未遂，召集了×××、×××等六同志开座谈会，企图摸革命群众的底，并进行分化瓦解。当革命群众贴了筹委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有些人就找贴大字报的人谈到深夜二点钟。

〔二十〕九月中旬至下旬：省委一少撮人对党校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行动，恼羞成怒，组织了一些单位对二十五个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和大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围攻，省委常委李维新亲自指挥，商业厅王长利俊亲自动手策划。省委安置办公室主任刘建平指使下，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印发了反革命传单，向全国散发，

竟想并告党校革命群众要“黜座勒马”。在机关党委的简报上则说这些人（指党校革命群众）“凶道寡助”，“在群众中很孤立。”一时乌云密布，而筹委会某些人却窃笑自喜，扬言“这才刚开始哩！以后大字报还要来得更多，再说什么‘就是这么干不防’。讽刺打击革命闯将的革命行动。

〔二十一〕九月中旬：校外革命形势汹涌澎湃，革命群众要求到校外去进行革命串连，遭到筹委会少部分决策人的阻止，有的革命群众冲破阻力到医大进行革命串连（医大当时是外地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联络站）而筹委会某些成员则把医大说成是“火油桶”、“导火线”、“57年闹革命最积极的地方”，说什么“进行革命串连要先通过筹委会”。

革命群众要求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筹委会少部分决策人也有般阻挠，在会上读了一个《红卫兵不图远征雅》的社论，强调指出：要串连就进行全程步行串连，如果只走完一半走不动就宣告失败。“实际上是在给群众进行革命串连制造重重困难。

〔二十二〕同一时期：外地革命师生热情来校进行串连，却遭到筹委会少部分决策人的刁难。提出什么“要派介绍信”，“带红卫兵的袖章”。革命师生提出要来我校看“把门将军”，而筹委会主任刘光烈则说什么“我校没有什么把门将军，只有传达室老王。”当革命师生提出要参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锐的展览馆时，又说什么“没有什么好参观，只有几本日记本，你们要看，我拿一本给你们看。”就是这样把革命师生

生一个一个地顶回去。

〈二十三〉九月十七日：革命学生在杭大召开了“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经~~党校下一厅主席团的席位。筹委接受了机关党委的黑指示，拒绝参加，并封锁消息，不让革命群众知道，剥夺了革命群众参加大会的权利。直到现在，筹委会仍然对革命群众保密，不敢揭机关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

〈二十四〉九月十九日：在筹委会少政决策人的压力下面，筹委~~首~~员~~马~~平，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无可奈何向筹委会作检查，说支持“25个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有人说错了，我也认为“大方向错了”。“服输”了。

〈二十五〉同一时期，机关党委派了联络员多人和筹委会密切联系，筹委会有些人划上窜下跳，把有关党校运动的黑材料源源不断地送~~给~~省常委，从此，省委把党校视为一个“危险单位”。省级机关文革办公室主任×××布置：“以后要多关心党校运动。”

〈二十六〉九月二十二日：再一次召开了声讨朱赤~~罪行~~大会。在会上仅揭露了朱赤在运动中的态度、组织路线、生活作风的盖子。没有把盖子揭露清楚，会议中途停止。会议筹委会内部吹出了冷空气，筹委会付主任刘良吉散布“朱赤是三类干部、四类态度”甘端小调，朱赤问题搁浅三月之久。

〈二十七〉九月二十三日：受朱赤长期政治迫害的王世厚同志，~~在~~在声讨朱赤罪行的大会上进行了控诉，暴露了朱赤的丑恶灵魂，激起广大党员的义愤，要求立即恢复王世厚同志的党籍。筹委会有些~~人~~，对此态度冷漠，直到最近，居然说：王世厚究竟是左派~~还是右派~~，要通过运动检验，恢复党籍要到运动后期才能考虑。依广大党员提出的建议，搞立正纠正。

〈二十八〉同一时期：朱赤老婆、地主分子严宜冰作了许多坏事，广大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对他进行迅速处理。而筹委会有些人在绍兴会议上讲：“把严宜冰放到湖州市也是吃国家的粮食，放在杭州也是吃国家粮食，当在党校机关里还可以作个反面教员。”竟然不顾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对地主分子严宜冰进行庇护。

〈二十九〉九月下旬：~~匆匆忙忙~~改造党支部。筹委会付主任刘良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面目在~~群众中~~暴露无遗，筹委会少政决策人为了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九月二十九日提出改造党支部。为了保证筹委会一些委员能选上支委，甚至违反党章规定、说什么“不参加社教运动的同志，即使有党的关系没有转回枝的，也可以破例参加支部选举”，各支部的候选人名单~~上~~筹委会少政决策人决定，并提出：“~~马~~平支持过25个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曾~~支持过二次红卫兵会议，这是~~点火~~，虽然检讨认错了，尚无真正认错

的表示，不能当支部委员”。而刘良吉由于阻止，打高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有功，被内定为组织支部的召集人。候刘良吉控制了教“支部”，窃居了支部书记的职务。这实际上是抄袭了“朱赤式的投机卖部”的做法。

〈三一〉九月下旬：党支部刚成立，刘良吉受孙润之的指示，对革命群众进行逐户调查，排队，企图在运动中抓小辫子，整革命群众，但遭到革命群众的抵制。

〈三二〉同一时期：从筹委会内部进一步刮出冷风、吹出冷气、泼出冷水，大灭革命烈火。筹委会主任刘良吉等人，和“新之联络员”罗平等人不断联系，进一步推行以陈冰为首的前筹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过去散布的滥调：“党模运动面搞宽了”、“太过火了”、“应关油门了”、“应该杀毒了”……重新搬出来。

〈三三〉国庆节后：在筹委会“关油门”的谬论指导下，筹委会要革命群众总结前段运动，布置学习“十六条”中4、5、6、7条，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革命群众掌握政策。又散布什么“17级以上干部要带头掌握政策。对林彪同志所提出来的、红旅十三期社论所强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字不提，使我校运动再次出现曲折。

〈三四〉同一时期：筹委会主任任宗华全面布置了：“填语录、

抄红”、迎接你二八快活；“三个代表”和“三个必”。

大革命运动，根本不搞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三五〉同一时期：在筹委会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国庆节后，运动也就戛然而止了；既不揭盖子，也不斗黑点，又不支持革命大串联，更避而不谈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些牛鬼蛇神纷纷露脸。

〈三六〉同一时期：革命群众为了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积极开展了对校文革筹委会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但阻力重重，筹委会少政决策人散布什么“筹委会是群众组织，不存在反动路线的问题。”批判筹委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候牛鬼蛇神兴高采烈。他们把牛鬼蛇神与欲猖狂归罪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把责任推到革命群众身上，企图在革命群众脸上抹黑，抵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三十六)十一月四日：孙润芝代表筹委会作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没有引火烧身，而是别有用心的推出刘良吉、刘卿文作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据说筹委会研究时，称是真刘良吉、陈卿文二个人的名字，动员时，孙润芝则推他们为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会车保帅”。同时，在会上突然单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让筹委会主任刘光业在会上表态（实际上是在标榜自己），令孙润芝跳出圈外，结果造成广大革命群众极大不满。

(三十七)十一月四日晚：革命群众揭了刘良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而刘良吉公然向革命群众挑衅，肆虐极甚恶劣，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愤怒，和刘良吉进行了通宵斗争。当革命群众遇到刘良吉快要揭筹委会盖子的时候，筹委×××突然提出明天王一波、陈卿文准备支持，合盘转移斗争目标。

(三十八)十一月廿九日至十二月二日：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筹委会被迫召开了扩大会，闭门交锋。这次会议，不仅是坏如一般坐而论道，而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革命群众反扑，他们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在会上，筹委会有些人，把贴他大字报的革命群众骂为“混蛋”，是“国民党的党史教研室”，并气势凶凶的威胁说：“现在搞筹委会，下一步对××教研室的问题也要清一清。”“批判了我就是和毛主席唱反调。”甚至于别有用心的提出：“××教研室称有×××是革命的”企图挑拨群众斗群众。有的人在会上一唱一和，准备“秋毫无犯”。

(三十九)十二月六日：筹委会处心积虑向革命群众抛出了“四点公告”，标题是“我校运动向何处去？”在筹委会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盖子没有揭开、影响没有肃清、根子没有挖出的情况下，要革命群众立即转移斗争目标。这不能不使革命群众深思。

(四十)十二月七日：召开了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革命群众揭发批判了刘良吉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议快结束时，筹委会某些委员一方面为孙润芝摇动，一方面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说什么批判筹委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转移大方向。有的人说什么：“批判反动路线，会使敌人兴高采烈。”极力抵制对筹委会少数决策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批判。

(四十一)筹委会建立以后，执行了“没有谭力大的谭力大路线”。长期以来，筹委会某些人对运动中比较积极的人进行中伤，说：“××人老婆是大地主出身”。“××人社会关系复杂”，“××人在运动中想捞一把。”同时有些人拿政治死期做交易。有的人在工人群众中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企图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十二)筹委会成立以来，长期因袭了米芾式的家长制领导，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充分发扬民主，同群众商量。就是筹委会内部，也抵

是少校决策者说了算。

(四十三)十二月中旬：为了实现筹委会转移当前斗争目标的目的，有些人以革命串连为名，到各组进行游说，对当前运动的形势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把刘良吉靠边站，迅速把矛头指向朱赤等人；一是束手大逃，什么显示都提，乱打一通；一是革命群众分裂，各干各的。三条方案归结起来，就是该有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方案。

(四十四)十二月下旬：筹委会提出处理黑材料的意见，实际上是遵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材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证，筹委会企图革命群众转弯，竟由少校人（其中有的后来就是搞黑材料的人）主观提出处理意见，把它强加于革命群众，这不是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红工战斗队
红武战斗队
红旗战斗队
东风战斗队
东方红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来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给同志们提供校党委反前领导小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整理了这份《大事记》。由于参加整理的同志对这劫的情况不很熟悉，加上水平限制，错、漏之处在所难免，仅供同志们参考。

这份《大事记》所记述的情况，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谈以下三丁问题：

一、校党委、前领导小组确《实》、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初则封锁消息，设置重重障碍，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继则划框《定圈子》，放暗箭，要阴谋，玩弄“枪杆保皇”的手段，企圣转移目标；到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组织翻墙，以反革命的大字报，疯狂镇压，把革命群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等。给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劫造成极大损失。因此，本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点应该校党委反前领导小组。

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护身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赤等人，在这劫一开始就同这条反动路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死抱住这条反动路线不放，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自己

已过关。因此，我们要坚决打倒、斗争、斗臭朱赤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先必须彻底揭露、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这是当务之急，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这是使这劫继续前进的关键。

三、前省委文革小组组长陈冰，是我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赤领导革命群众群众这劫的“后台老板”，他是我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陈冰、朱赤等人，结成一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朱赤的“黑计划”、“黑名单”和许多反革命主张，有的直接来自陈冰，有的得到了陈冰的默认，因此，我们必须穷追猛击，既彻底揭露和批判校党委和前领导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以陈冰为首的前省文革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朱赤，打倒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抗拒革命群众这劫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以后将陆续整理）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革命联合战斗兵团 办公室 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省委工作组进校前，校党委、前领导小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事记

我校在省委工作组进校前的文化大革命这劫，按照这劫的发展的情况和以朱赤为首的校党委、前领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分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五月十三日至六月二日〉

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下达前后，朱赤等人封锁消息。

按兵不动，只组织少部分人，搞秘密活动，限制群众革命。

五月十三日：

全校党员干部会，传达中央《纪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

朱赤不亲自传达，受到省委的批评。

从这天起，全校正式开始学习文化大革命问题。

朱赤指定人员成立五个所谓“战斗小组”，规定任务，边学习，边写文章。

此后，全校一直处在关门学习之中。

五月二十四日：

朱赤指定成立“文革办公室”，派亲信李则东为主要负责人。

文革办公室成立以后，一直搞秘密活动，根据陳冰等人指示，搞学刊、校刊文章排队，把广大革命同志撇在一边。

李则东反对广大革命同志关于增加文化大革命学习时间的要求，说什么：“你们利用一个晚上当作一般政治时事学习就行了。”

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下达以后，朱赤等人一直抗拒中央指示，封锁消息，以“等待省委布置”为借口，压制广大革命同志起来革命，并且别有用心地布置学习国际形势、刘、邓的讲话等。一直到六月四日才被迫作第一次“动员”。

第二阶段（六月三日至六月三十日）

朱赤等人迫于形势，被迫“上马”，他们一方面以“划框框”定调子、布置亲信，控制运动领导权和牺牲小卒，保存自己等阴谋手段，转移斗争目标；另一方面，对革命群众进行造谣、诬蔑，刮妖风，泼冷水，打击革命。

六月三日

杭大政治系范广品等十九位同志送来一张题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揭露以朱赤为首的科研所揭橥革新的政治斗争变成学术批判的大阴谋。朱赤吓得发慌，一方面匆忙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拼命推卸责任，另方面，向他的上司陈冰求援。当晚，陈冰指示朱赤：“现在形势不清楚，要观察几天，不要轻易表态。”

在毛主席亲自批发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鼓舞下，本校革命同志热情很高，纷纷要求投入运动。下午，领导小组为了应付群众，在朱赤主持下，召开会议，根据陈冰的“黑指示”，通过了“六条意见”，提出了什么“现在要贴大字报的同志可以贴大字报”。规定“大字报‘内外有别’，不准出校门”等等。“六条意见”实际上是束缚群众手脚，压制革命群众运动，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纲领。

晚上，王连吉等三同志贴出了《坚决支持杭大政治系同志的革命运动》、《这是为什么？》两张大字报。这是本校第一批大字报。

六月四日

上午，行政处刘光业等同志也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党委和科研

所领导。

朱赤为了压制革命运动，召开全校工作人员大会，布置了他一手炮制的“六条意见”。他做贼心虚，不敢提倡写大字报，只提可写小字报，不敢提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只说横扫“专家”、“学者”、“权威”。同时宣布成立文革办公室，安排亲信李则东、迟洪美等操纵文革办公室的领导。

当天上午，针对文革办公室同志在第一天晚上贴出大字报的情况，朱赤急急忙忙召开文革办公室人员会议，以“不要泄露领导意图”为名，下令“办公室人员不要写大字报”，妄图扑灭刚刚起来的革命烈火。

下午，各组讨论“六条意见”后，纷纷揭露朱赤对运动的错误态度，提出文革办公室人员名单要公布。朱赤拒不接受，还说：“我们不反对贴大字报，也不提倡贴大字报。”保皇分子迟洪美利用数学支部书记职权，公开为朱赤辩护，说什么“朱赤的意见是省委的指示”，一再强调要按朱的“指示”办事。

六月七日

朱赤指定亲信马宇良起草“学习解放军报社论”的计划。

六月九日

王连吉同志写了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行的大字报，地主分子严宜冰等人抓住王连吉在大字报上写到带引号的“平易近人”“意志衰退”等语，进行围攻。

六月十四日

陈冰来校看大字报。当时，我校由于朱赤等人的破坏，很少有揭

党委特别是朱赤的大字报，但是陈冰却一口赞扬“党校的大字报质量很高”，还作了一些“黑指示”。

六月十五日

王连吉同志贴了揭发马守良的大字报，遭到李则东的疯狂的压制，污蔑王连吉同志“指导思想不对头，思想方法片面”“句子过急，帽子过大”“贴得不是时候”等等。

朱赤根据陈冰的“黑指示”，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炮制了“运动计划”。为了保护自己过关，公开篡改中央《通知》精神，提出：“把对象扩大，把审查范围扩大”，主张把揭发问题的范围扩大到“除文章外，讲课、讲话、教材、资料，平时言行”等等，“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把党校、科研所人员中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彻底揭露出来”，企图制造“错误言论人人有份”。这样就充分暴露了朱赤和陈冰狼狈为奸的真面目。朱赤找揭发他问题的马平同志“宁别谈话”，抵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企图封马平同志的嘴。

六月十六日

朱赤召开全校干部会议，布置在十五日领导小组会议上制定的“黑计划”，提出“凡本校干部在校内外发表的文章都要加以审查和揭发”。

革命同志把魏榜撤回学校，陈冰指示朱赤，要朱找魏谈话：“接受教训，年纪还轻，不要紧张”，竭力为魏榜撑腰。

(四) 王连吉同志又写了揭发马守良和李行的大字报，在马群等人的策下，写了《科研所主帅是谁？》和由严宜冰起草的、以资料室名义

贴的《王连吉心目中的主帅是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经过李则东审查)这两张大字报是根据朱赤的意图写的，目的是打击王连吉同志，实现打“死老虎”王文彬，保护朱赤。他们还在小组会议上散布流言蜚语，说王连吉是王文彬的“亲信”，是“秘书”。

马平同志向朱赤开了第一炮，写了《校领导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抓得不紧，没有抓住》的大字报，揭露朱赤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严重问题。接着梁学健、王宗功两同志写了《党校的关键在那里？》的大字报，指出党校问题与朱赤、周林有关。朱赤当时情绪十分紧张。

从转入揭发党委问题以后，迟洪美调子忽然低下来，一再强调所谓“摆事实讲道理”，一再给朱赤定调子，说朱赤“是三类干部”。

六月十七日

迟洪美造了梁学健同志的谎言，说：“我在十六日写的这张大字报，原来的标题是《反党主帅——周林、朱赤》。”还说：“梁学健同志同迟洪美敢不敢签名。”迟洪美把这宁谎言向朱赤等等回报，马群、严宜冰周攻梁学健同志时，把这宁谎言作为“一个重要的炮弹”。这宁谎言后来传播很广，一直飞到周林那里。

六月二十日

马平、梁学健经过革命串连后，由马平同志向朱赤许口照：迟洪美诬蔑她是“非组织活动”，抓住不放，借此打击马平、梁学健同志，魏维让等也积极参加迟的这些活动。

在此前后，工人同志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揭露朱赤等人反毛泽东

思支 罪行

六月二十一日

革命群众由猛攻《希甫华》转向揭批党委，特别是揭朱赤的问题。王连吉同志贴出《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面》的大字报，揭露校领导害革命大字报和李则东等压制革命大字报的行为。

六月二十二日

马平同志写了《校党委本身盖子没有揭开》的大字报，比较全面地揭露了校党委、特别是朱赤的问题，从而鼓舞了革命同志，也触怒了朱赤的亲信，遭到了他们的谩骂。教研室任福儒等同志写了《朱赤是怎样使用孙信华的？》大字报，郭彩莲等同志写了《向朱赤提几点问题》的大字报，指出《希甫华》在我校的根子是朱赤。

同时，梁学健同志贴出《李则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大字报，根据王连吉同志提供的情况，^{首先}提出将李则东调离文革办公室的建议。

六月二十三日

早上，马守良组织高光、魏榜、王家甫等人，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专栏，制造“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阴谋。

同马守良等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组办小组吴虹味等同志贴出了《看，李则东在运动中干了些什么？》《李则东在运动中的言和行》等革命大字报，矛头指向李则东，指向朱赤。得到了许多革命同志的支持，纷纷要求将李则东调离文革办公室。

朱赤当时预感到如果失去李则东这个“把门将军”，自己就有垮台

的危险。于是就同王一波、吴虹味三人在西湖边密谋后，通过领导小组决定成立以王一波为首的“调查组”，名为调查李则东的错误，实际上调查王连吉的革命大字报。许多同志反对这种做法，朱赤一意孤行，其目的是压制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朱赤还在当天晚上找梁学健同志个别谈话，责问梁：“为什么会有那样想法？”并威胁说：“革命的再说也是革命的，反革命不说也是反革命的。”等等，对革命群众施加压力。

第三阶段（六月二十四日至七月六日）

革命群众矛头针对朱赤等人，朱赤就颠倒黑白，极力混淆革命及革命的界限，组织亲信，以反革命的大字报，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公开镇压革命。

六月二十四日

组办小组《看，朱赤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行政小组《朱赤你是真革命吗？》、毛选班学员金文斌等四同志《朱赤是真革命吗》、朱少英等十位同志《向朱赤、张拯冀提几点意见》等革命大字报，矛头都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的亲信。当时，梁学健同志根据广大革命同志的揭发和运动情况，写了一张《物极必反》的革命大字报，提出朱赤是“家天下”，李则东是朱赤的“把门将军”的儿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警告朱赤不要重演北大南大的丑剧，同时揭穿了组织“调查组”的大阴谋。

朱赤、李则东等人被革命大字报吓得发慌，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这

动，决定先从反击梁学健同志开始，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保皇急先锋马群的“公开信”“呼吁书”等反革命大字报在第二天早上出笼，把梁学健打成“牛鬼蛇神”。这样一场由朱赤、李则东导演的公开镇压革命群众为目标的反革命丑剧开场了。

六月二十五日

朱赤在讨论李则东问题的领导小组会上，公然为李开脱罪责，说“老李历次运动都是积极的”“是宁左派”。说李离开文革办公室不是纪律处分。

全校“围梁保皇”的反革命丑剧继续表演，马群的反革命大字报受到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的附和，也蒙蔽了少数一时不明真相的同志。励祯海等人贴出大字报说：“马群同志说得对，说得正确”“真心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牛鬼蛇神就在身边，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妄图把水搞混，妄图搞乱我们的阵线。”这时，校里革命群众弄得人心惶惶，出现了白色恐怖。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天，马群等人未休息，继续“磨刀”，准备进一步“围梁保皇”。

六月二十七日

马群经与李则东密谋后，同励祯海合写了《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积极必反正好用在梁学健的头上》的反革命大字报，大肆谩骂梁学健“反对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说梁的大字报是“阴谋”、“诡计”；梁是运动中“绊脚石”，要扫除，还说与果要“奉陪到底”；谁怀疑有后台老闆要“碰得头破血流”。

朱赤一早就来看这两张大字报，脸带笑容，自以为得意。马群并发动资料室部分同志进行“围梁保皇”。他用煽动口气说：“你为什么不支持我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在马群煽动下，出题目，定范围，资料室部分同志，当天上午不到半小时，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苗、地主分子严宜冰及王正南、钱云英等人也贴出《最坚决最热烈支持马群、励祯海的大字报》，说他们“举双手拥护”“大快人心”；把这些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示众”。下午又写了《拆穿积极必反的大阴谋》，说梁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胆敢在我们党校阵地上公开煽动群众，制造混乱，这是梦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等等。

励祯海等人又贴出二张大字报，一张是所谓《紧急建议》，公开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李则东翻案，要党委不要将李则东“轻易采取调离办公室的办法”，要李则东“硬起腰杆，大胆工作。”另一张是《质问梁学健》，说梁是个“神秘人物”，责问他“妄图究竟是什么？你的居心何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行等贴出题为《梁学健：你必须把全部事实摆出来》的大字报，诬蔑梁刮起了“妖风”，说“黑话”，坚持“要摆出全部事实”，“否则，就是投机取巧，制造混乱，混水摸鱼。”

当天，李行、马守良、乐梅新等人在马群家关门开密谈会，搞反革命情报，马指使乐梅新去浙大查对梁的大字报，企图抓梁学健同志的辫子。

白色恐怖一时笼罩我校，有的同志不敢写大字报，有的在大字报上签了名的想涂掉。

六月二十八日

朱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合会，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策划镇压群众运动。会上：

王一波说：“搞群运运动混战好象是不可避免的。”

吴孟驷说：“梁学健‘很难说没有企图’，‘如果他是一个问题，让他暴露下好了，他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

张拯黄说：“梁学健的问题一出来，这样搞乱了。我们党委心中要有数，不受干扰，把注意力引到主要方面去，不为他所左右，好好学习一下，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搞下去。”

迟洪美说：“不要砲对砲。”

朱赤为了继续控制领导权，决定要王一波负责文革办公室，为王一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组织准备。

吴孟驷在支委、小组长会议上公开说：“除了梁学健的大字报外，其他都是革命的大字报。”

朱赤的“把门将军”李则东对革命群众怀恨在心，赤膊上阵，镇压革命群众，连续写了题为：《“物极必反”是向党进攻的反革命号召书》，《“物极必反”是向党校全体人员向党委进攻的动员令》、《“物极必反”是梁学健向校党委提出的劝降书》两张反革命的大字报，交马群修改，张拯黄审查，用最刻毒的语言，诬蔑、咒骂梁学健同志，说“在梁学健头上放几包炸药”。只因这样做太“露骨”，未敢公开出岔。

资料室里马群攻击夏文豪是“梁上小丑”。还说：“当梁的大字报出来后，气焰嚣张，有人高兴得不得了。”严宜冰更疯狂地叫嚷：“还将这样压人，否则，真不得了啦！”

梁学健同志贴出《致革命干部、工人同志一封公开信》，以事实回答了马群等人的挑战，呼吁全校同志作出公正的批评和指正。

朱赤第一次向工人作动员报告，李则东到工人中组织“围课”的大字报。

六月二十九日

朱赤继续主持召开领导小组合会，进一步策划镇压革命群众运动。会上，出现“外围梁学健，内围马平”的局面，暴露了朱赤等人的反革命面目。

迟洪美滥用群众名义说梁学健同志的大字报“没有事实根据”、“粗暴”、“不是革命的”，还说少数的“积极分子”对梁学健很气愤，要求把他调离办公室，叫他好好反省去学习”，说什么“少数人对梁学健的大字报认识不清，盲目支持”，还提出“梁的大字报不是冒失干出来的，有人支持他，有人帮他的忙的”，“有根子的”。

李则东说，梁学健的大字报，“不是他一个人，不是一般问题”。说什么“梁学健是绊脚石，不搬，运动不能发展下去。”

王一波提出“梁学健究竟是什么人；这样呼风唤雨，有点骄傲自满，想做北大的聂元梓，群众反击一下是必要的”，“如果不搞就算，如果要搞，让他暴露一下，证明我们不是牛鬼蛇神的话，他是什么呢？”

吴孟驷说对梁学健，再“不贴出来摆一摆，贴出来非应战不行。

我们的反击不是批一頓行的。”

朱赤更是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一面积极抵赖自己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一面又叫喊同谋的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要“彻底弄清楚，如果我没有这样问题，反过来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领导小组会议散会后，朱赤把一份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交给迟洪美，指示他“以后把这方面的情况掌握起来”，还布置迟了解掌握梁学健同志的情况，为进一步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准备“材料”。

迟洪美根据朱赤指示，布置亲信陈正元、×××、××等人，大肆进行特务活动，查历史，抓辫子，盯梢、造谣，抄黑名单，搞黑材料，为朱赤围攻、打击、镇压革命群众提供“情报”和“炮弹”。

资料室继续“围梁”，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苗污蔑不表态的革命群众是“骑墙派”，地主分子严宜冰等人，昨晚在马群那里召开密秘会议，马群提供炮弹（关于《周林、朱赤两个反党头子》的谣言问题），继续写了《再斥“物极必反”》的反革命的大字报。

王宗功同志写了《无名大字报》反映了广大革命同志对朱赤等人所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的憎恨。

毛选班学员王友生等十位同志贴出《究竟应当保卫谁？批判谁？围攻谁？》及《一详形势》《二详形势》等一批革命的大字报，旗帜鲜明，观点明确，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是有人故意“颠倒黑白，不分是非，把水搞浑”，“有意放乱枪，转移目标，制造混乱”，致使“三家村”黑伙喜笑颜开。这样就为反击朱赤等人的反革命行为吹响了冲锋号，大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

六月三十日

朱赤召开全校学工人员大会别有用心地传达江华同志在省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有关错误的报告，提出了把运动深入下去“五项措施”：妄图继续操纵运动领导，蒙混过关。王一波则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在大会上向群众假“表态”，一面则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晚上，斯章芝、孙义鸿、郭翠连三同志贴出了题为《资料室有些人干了些什么？》的革命大字报，用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李则东、马群、严宜冰等人的保皇活动，表示这次运动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开始打击了他们（她）们的反革命气焰。

同时，王连吉同志贴出一张《揭保皇派、保夫派》的革命大字报，同马群、徐苗、严宜冰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尖锐地揭露了“保皇派”、“保夫派”联合进行反革命活动，提出分清真正的敌友，和重新建立革命派领导小组的革命要求。

夏文豪同志贴出大字报《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针对党校确实存在着的一股抗拒革命群众运动的歪风，表示有“坚强的信心，压倒这股“西风”，“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七月一日

朱赤继续玩弄新的阴谋，召集、主持党委会，炮制了所谓“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计划”，提出搞“三大战役”，强调“由事到人，揭事不揭人”，不提要揭发党委的问题，定下了二十七天时间搞好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在图草率收兵。

朱赤为了实现“牺牲车马，保存自己”的阴谋，指使，授意亲信

(八)

迟洪美等人开辟了揭王文彬问题专栏。

朱毅明、沈海英等八同志贴出大字报《怎样才能使腰杆子硬起来》，表示支持斯章芝等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不指名地批驳了尹宜冰、励振海等人的观点。

工人王俊甫、裘锡泉、余勤之、钟文贤等同志坚定地站在革命同志一边，^{写了许多革命大字报，支持革命同志}，同朱赤等人展开了斗争。工人同志在这场反“围剿保朱”的斗争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七月二日

朱赤亲临数学支部传达党委的“黑计划”，招摇撞骗，笼络人心，同时污蔑深学健同志是“浙大丢给我校的包袱”，为继续围攻革命同志制造舆论。

保皇分子迟洪美积极推销朱赤的“黑计划”，一面奉朱赤之命布置大揭“小三家村”，配合玩弄“金车保帅”的阴谋，一面积极叫嚷要揭行政处、医务所、托儿所等部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提出行政工作方面也要单独作“一个战役”，妄图转移斗争目标，积极为朱赤保驾。

七月四日

王一波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污蔑夏文豪同志的革命串联活动是“拉扯”、“不正派”。

张拯黄叫喊马守良是“左派”，运动“不要搞到左派身上”。

以后，迟洪美布置王乃柱将夏文豪等同志的所谓“不正派”活动记下来，为继续镇压革命同志准备材料。

1966.25

李则东布置迟洪美找几个支委活动一下，“支持党委”，还说“组办小组有人反对党委的计划，夏文豪是一个。”

七月五日

朱赤召集迟洪美等四人“秘密集会”，进一步策划破坏运动。会上，迟洪美向朱赤献策，除了搞“三大战役”以外，还要搞行政问题，资料工作，医务工作，要“把文化部教育利用假期揭露，问题重的留下来”，还排出了黑名单，提出了XXX廿六人。这是朱赤等人破坏运动的又一阴谋。

李则东串通马群，不通过支部，布置以改造小组为名，讨论了三个半小时，提出了七种方案，攻击了马平、斯辛芝等同志，责问马平“支部站在什么立场要改造支部”，攻击斯辛芝等同志“拉拢社论，极不正派作风”，攻击学员，谁怀疑后台老闹，就要碰得头破血流。

至此，激烈的群众革命运动由于朱赤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阻挠、破坏，搞得冷清，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夭折的危险之中！

鉴于校党委、前领导小组所作所为，群众已完全不能信任，这时，群众纷纷要求省委派出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

(九)

革命联合战斗兵团办公室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